



新发展阶段我国“多中心治理”型 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李中仁,刘 军,陶云飞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

摘 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核心在于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这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引导,也离不开企业和职业院校的积极参与。在我国传统的“单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中,政府难以对地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有效引导,职业院校和用人单位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又无法充分发挥。有鉴于此,“十四五”时期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应努力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型,重构政府与企业、职业院校之间的权责关系,从而促成多元主体优势互补、协同治理的局面。

关键词: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多中心治理

中图分类号:G71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1X(2022)05-0012-08

DOI:10.19899/j.cnki.42-1669/Z.2022.05.002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1]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速发展,需要社会培养更多的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有鉴于此,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业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核心在于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这既有赖于政府的战略支持与引导,也离不开企业和职业院校的积极参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职业教育工作一直遵循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虽然在过去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大批优良的劳动者,但显然已经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因此,如何对既有的“单中心治理”模

收稿日期:2022-07-27

基金项目:2017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哲学青年项目“产业政策视角下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构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YBQ078);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哲学青年项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我国劳动关系治理的挑战及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9CZZ024)。

作者简介:李中仁(1985—),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劳动政治、区域治理、土地制度改革;刘军(1998—),男,江西萍乡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基层治理、职业教育;陶云飞(1995—),女,湖北十堰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企关系、基层治理。

式进行改革创新,进而重塑职业教育体系中政府、企业与职业院校三者的角色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就成了新发展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党和政府大力推动和发展职业教育。经过长期探索,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行业办学为主要特色、计划体制为根本特征的职业教育体系。^[2]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既有的职业教育体制遭受到严重破坏,职业教育工作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重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总体而言,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4]:

(一)政府主导的发展阶段(1978至2000年)

此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职教工作被纳入各级政府对社会的公共管理工作之中。具体而言,可将这一阶段细分为两个时期:

1. 大规模建校时期(1978至1991年)

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开启了大规模建校的时代。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指出,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计划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和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比例。^[5]自此,扩大各类职业学校的比例,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方向。^[6]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倡导下,各地纷纷开始建设职业院校。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只有103.9万人,农业、职业中学总计70.4万人,技工学校总计51.2万人;^[7]截至1991年,我国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已增长到633.2万人(含技工学校学生142.2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总数1356万人的46.7%,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168万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在校学生3165.7万人^[8]。

2. 法律制度初步完善阶段(1992至2000年)

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将教育的发展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并要求积极发展职业教育。^[9]这一阶段以法律制度的完善为主要特征。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划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了法治时代。

(二)“政府为主、企业为辅”的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开始重视市场力量在职业教育治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然而,受制度惯性的影响,至今我国大部分地方还是沿袭了“政府为主,企业为辅”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以企业参与我国职教治理的程度来看,这一阶段也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

1.“政府推动、企业参与”的探索期(2001至2010年)

随着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开始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内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劳动者和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激增。在此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均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尝试对职业教育工作进行改革创新,推动了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的发展。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多次重要会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建设战略进行了系统规划。例如,2005年11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被提到了空前高度。会议首次提出,要逐步增加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模式。^[10]在地方层面,沿海发达地区也开始结合本地域产业特色,改革创新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例如,广东省开启了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探索,江苏省也开始创办省级行业性职教集团。总体而言,职业教育工作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政府发起、企业协同治理”的新时期(2012年至今)

十八大以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全新阶段。2012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将满足行业需求作为新的突破口,实现人才培养过程中“产”与“教”两方面内容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11]至此,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多个文件和政策以促进产教融合的发展。概括来看,这些政策主要涵盖了地方政府职责、企业保障、学生保障、课程模式、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几大重点领域。在政府的发起和保障下,各类企业开始参与到我国的职业教育治理事业中来。例如,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开始与政府和高职业院校合作共建各种产业学院,直接参与校企深度合作的载体建设之中。

二、“单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弊端

回顾历史可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这种以政府办学为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模式的局限越来越明显。例如,职业教育的育人能力以及服务经济社会的水平提升较慢,民众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升反降。^[12]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主要还是由于现有的职业教育工作过分强调政府主导,职业院校和用人企业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不高,进而导致职业教育的发展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13]。具体来说,现有“单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角色错位

政府角色的错位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最大弊端。所谓“错位”,是指政府一方面对职业院校的管理超出了必要的范围,即政府角色的越位;另一方面又对职业教育体系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即政府角色的缺位。政府角色的越位主要体现在对职业院校的管理上。现实中,作为职业院校的管理部门,各级政府往往习惯于通过颁布政策、规定和行政命令(通常以“通知”形式呈现)的方式来指导职业院校的办学,却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和职业教育本身的客观规律,导致很多职业院校疲于应付上级部门的各类检查,难以集中全部精力用于教学之中。^[14]

政府角色的缺位则主要体现在财政投入与政策引导方面。首先,相比于德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在职业教育上的财政投入上依然有明显的差距。研究显示,2017年德国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总支出为387.2亿欧元,占德国当年GDP总量的1.18%,其后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5];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可知,我国2020年

职业教育总投入为5630亿元,仅占当年GDP总量的0.55%^[16]。不仅如此,统计数据还显示,我国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投入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均衡态势。例如,2020年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支出为27006.24元,而贵州省仅仅是9053.86元,二者差距显著。^[14]其次,我国现有关于引导其他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很多只停留在宏观层面,无法得到基层的有效落实。以产教融合政策为例,诸多研究均发现,一些省份在推动职业教育工作时往往只是简单、僵化地执行中央政策,未能以中央政策为依据,结合区域特色,制定和发布适合本地区产业发展的具体实施意见,使得产教融合政策文本的实际指导意义缺失,政策执行难度较大。^[17]

(二)职业院校的依附性地位

职业院校的依附性地位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最大缺陷。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应以市场为导向来设置课程、培养人才,在这过程中职业院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然而在我国,各级政府长期以来都是将职业教育工作纳入到了正式的科层体制内进行管理,因而各类职业院校只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并没有办学的自主权。换言之,在现有的职教体系下,政府的权力延伸到职业院校的各个角落,使职业院校丧失了必要的自主性和创新的动力,处在对政府过度依赖的状态。虽然近年来国家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科研和社会服务、人事管理、考核奖惩等方面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此类改革并未改变职业院校对政府的依附性状态,因而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职业院校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18]

(三)企业参与度不高

企业的参与度不高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最大缺憾。企业是职教人才的最终归宿,理应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多年来,虽然各级政府一直在积极主动地推进产教融合战略,企业在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参与程度却一直有限^[19]。要言之,造成这一缺憾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现有产教融合政策多为宏观性的,尚未健全企业参与的细则;第二,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关于职校的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利益分配、责任划分、资本退出等一系列重要事项无法可依,放大了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风险^[20];第三,社会对职业教育存在一定偏见,很多企业更倾向于录用高等院校毕业的人才。总之,当前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使企业无法真正参与到职业教育中去。

总体来看,“单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弊端在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影响了职业院校的自主性和企业参与的意愿,进而导致政府负担越来越重,职业院校和相关企业却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社会和市场对职业教育体系和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认可度很难提升。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一现实困境呢?本文主张,还是应当从改进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方三大主体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间关系入手,推动我国的职业教育从“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转型。

三、“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优越性

(一)何谓“多中心治理”

“多中心”(poly-centricity)一词最早由迈克尔·波兰尼提出,最初被用于经济学领域。^[21]1990年,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出版了《公共事务治理之道》,指出“不论是以政府为核心还是以市场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模式都存在明显弊端——政府行政管理权的强势和泛化通常导致市场经济活力降低,社会僵化;过于依赖市场调节则往往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社会生活的失序”^[22],这标志着多中心治理理论开始被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其后,美国学者迈克尔·迈金尼斯对“多中心治理”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其与一元或单中心权威秩序不同,强调由社会中的多元行为主体基于一定的集体行动规则,通过相互博弈、相互调适、共同参与等互动关系,形成多样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制度或组织模式^[23]。

职业教育的“多中心治理”意味着在职业教育发展和管理中,除了政府这一行政主体外,还应将职业院校和企业纳入进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功能。政府需要让渡出部分权力给职业院校和用人企业,使职业院校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设置课

程专业,吸纳教学人才,管理资金的分配;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企业的需要和职业院校合作培养专业人才。但多中心治理并不是否定地方政府应有的权力和角色,而是规范政府权责范围,使政府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恰当的领域。并且体系内各治理主体的地位也并不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职业院校、用人企业等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依然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与监督。那么,如何构建“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使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找准定位,各司其职,发挥理论上的功能呢?

纵观全球,这种“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并非无迹可寻。德国、瑞士、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其中,德国的“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典范,其成功经验对我国“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德国“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内容

近年来,国际上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战后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职业教育的“二元制”。所谓“二元制”是指职业培训要求参加培训的人员必须经过两个场所的培训,一元是指职业学校,其主要职能是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另一元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其主要职能是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实际上,在政府的组织和协调下,德国已经形成了多方合作、双元兼容的协调机制(如图1)。这种协调机制的形成和发挥的作用对于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那么政府、用人企业、职业院校在这个机制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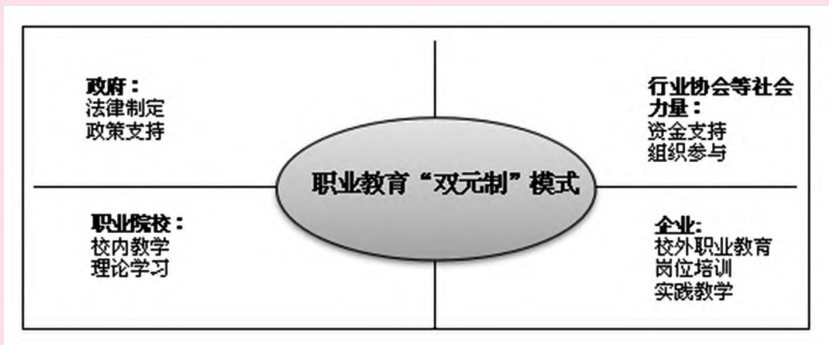


图1 德国职业教育“二元制”模式

德国政府是整个制度的组织者和监督者。首先,德国政府构建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制度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相应的政府机构直接负责各级职业教育的管理工作(如图2);其次,在这个框架下,搭建了一个由企业、工会组织以及职业学校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事务决策和商议平

台^[24];再次,形成了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体系,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体系中各方主体所以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同时保障了各主体的利益;最后,打造了合理的办学质量评价和监督体系,依托工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协会,对从事职业教育的相关企业进行审查和认定^[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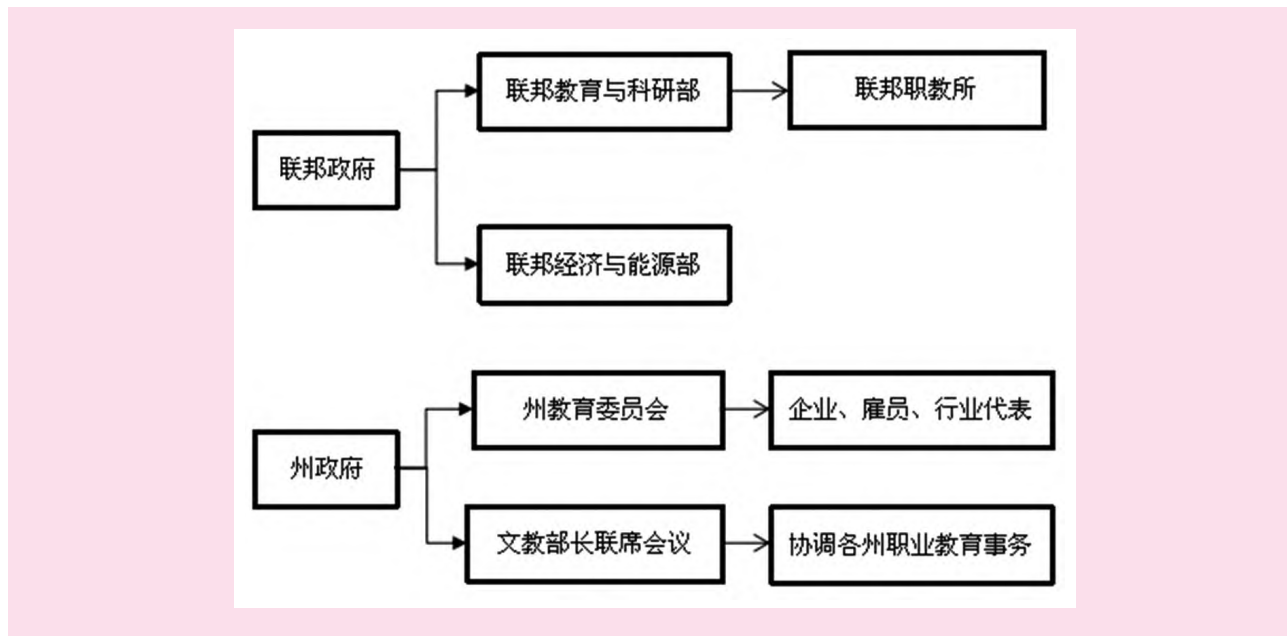


图2 德国职业教育管理体系

用人企业是法律、政策的制定者和校外职业教育的主导者。在二元制中,企业在两方面发挥其作用。一方面,企业主会选出代表参加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职业教育委员会,直接参与到相关法规条例的制定,对政府的管理工作提出建议^[26];另一方面,在校外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中,企业可以自行决定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实践教学和教学标准。通过这两种方式,企业在职业教育体系中不再是处于被支配地位,而是能够根据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将自身的意见和需求直接或间接体现在法律和校外教学过程中。

职业院校是校内职业教育的主导者。职业院校对于学校内部的事务具有极大的自主权。德国的职业院校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政府投资主办的,一类是由具备办学资质的企业或者行业协会所办。^[1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企业能够对职业院校的日常管理进行直接干涉。企业和政府只能对职业院校提出非约束性的建议和倡导。在教学内容上,职业院校会根据州教育委员会的法规自行制定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在人事上,职业院校的教师是学校

根据自身的需要自行决定;在学制和专业设置上,学校则会根据企业和政府的反馈进行调整。

因此,德国职业教育“二元制”的本质是以企业和职业院校作为二元教育主体,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企业和市场需求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方向;政府设计顶层制度、制定法律并对教学质量和效果进行监督;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者。各主体协商合作,优势互补,使德国职业教育成为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由此可见,德国“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很好地体现了“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可行性与优越性。那么,对于我国而言,又应当如何构建符合新发展阶段要求的新型职业教育体系呢?

四、我国“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路径

从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成功经验来看,构建“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在于理顺各主体的相互关系,厘清各方职责,保护各方利益。因此,本文认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

育体系的构建在于重构政府角色,发挥用人企业优势,完善职业院校职能(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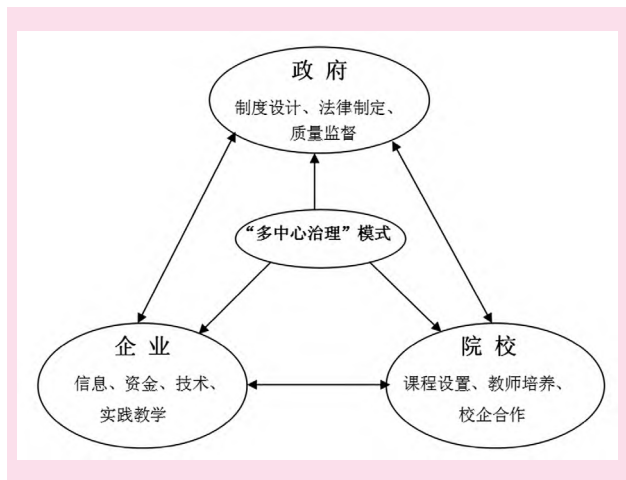


图3 “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

(一) 重构政府角色

政府是“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政府角色的错位是导致当前职业教育体系无法有效发挥其为社会输送专业技术型人才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角色的重构是构建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首要任务。政府角色的重构是指,政府调整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权责范围,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其他主体,将有限资源用于体系建设。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包括制度设计、法律制定和教育质量监督三个方面。

制度设计科学与否决定职业教育体系能否良好运行。我国要实现多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完善制度安排。只有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各主体才能在体系中真正发挥作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呈现出科层制的特点。职业教育体系中科层制虽然能够高效地贯彻政府的意图,并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职业技术日益复杂,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总是能够对于市场需求有正确和快速的反应。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政府必须建立好协调制度,将职业院校和企业纳入到职业教育体系中来,必须在制度上协调好政府与职业院校、政府与企业、职业院校与企业的相互关系,明确各方职责,避免形成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局面。具体来说,政府需要对职业院校和企业放权让利,着眼于大方向的指导,避免对职业院校和企业具体事务有过多干涉。此外,政府还需要建立与完善利益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以此吸引和激励职业院校和企业积极参与。

完善的法律是职业教育体系中各主体合法利益的根本保障。这里的法律除了宏观制度的法律外,还包括职业教育落实的细则。德国的经验是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由各州负责,按《州学校法》的规定实施;校外特别是企业形式的职业教育,则由联邦政府负责,按《联邦职业教育法》《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联邦劳动促进法》等法规执行。^[27]有鉴于此,我国也要大力加强在职业教育领域的立法和执法力度。中央政府应专注于设计和制定宏观制度层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则负责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这样既能保证中央政府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又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施政空间来根据地方经济结构的实际情况灵活培养人才。

有效的监督是职业教育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构筑起一套精准、高效、公正的监督体制,才能实现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进而培养出企业真正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激励企业方主动参与,最终形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25]政府监督应当包括对参与主体资质的监督和对教育质量的监督。前者主要是指政府应当制定统一标准,对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资质进行严格审批,保证参与企有资格、有能力承担教学任务。后者是指以科学的考核评价制度和技能认证制度对职业院校学生的专业能力进行考评,激励和约束职业院校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政府可以通过组织全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统考,来评价职业教育毕业生的能力,验证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教育内容是否符合标准。

(二) 发挥用人企业优势

企业是“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主导者。企业所拥有的知识、技术、人才、设备、信息、资质、管理等要素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生产性教育资源^[28],因而如何发挥企业的优势是构建多中心型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

发挥用人企业的信息优势。企业以营利为导向,能敏锐感知本行业的发展动向和技术需求,相对于政府而言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能够有效解决当前职业院校所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首先,企业可以派代表或者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在政策方案规划阶段将自身在市场中获取的信息反馈给政府,帮助政府切实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迅速调整和规划教育政策和实施细则,减少技能供给方向上的错配。其次,企业可以参与现有职业院校的管理或者新办学校,甚至深入到一线的教学过程之中。职业

教育一般分为两个部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活动可以直接将市场最新要求及时贯彻到理论教学中,减少理论和实践脱钩的现象。

发挥用人企业的资金优势。针对我国职业教育领域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的现状,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完全有能力弥补这一短板。用人企业可以将资金投入到学校和师资建设上,这样既能扩大学校规模,吸引专业技术教师,提升办学质量,又能缩小地区间差异,进而使学校更好地服务企业,从而形成人才培养与就业的良性循环。此外,用人企业投资职业院校,必定会给职业院校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等方面带去先进的经验,促使校企交流、合作成本更低,阻碍更小。^[28]

发挥用人企业的技术、设备优势。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大数据及智能制造技术迅猛发展,专业技术设备往往价格不菲。然而,职业院校的办学经费有限,对于昂贵的专业设备无法及时更新,这样便造成来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无法满足市场对新兴劳动技能的需求。因此,用人企业与职业院校应当积极合作,建立起有效的产教融合制度,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和设备优势,为市场培育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三) 完善职业院校权能

职业院校是“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什么政策,最终都是在职业院校中落实。职业院校不能只是执行政府和企业的命令,而应当积极参与到新型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之中。要想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的作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其权能。

首先,职业院校要主动调整学校现有架构。我国职业院校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基本形成了“校——院——系”三层架构。这种架构导致职业权力过于集中、职能划分过于宏观、院系自主权不足,管理重心主要集中于校一级,效率低下。这种结构布局不适应产教融合模式下职业教育的发展。^[29]因此,为顺应时代的要求,职业院校必须主动调整学校现有架构。具体而言,在学校层面,要进一步积极探索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议事决策制度,增强学校决策的科学性;在学院层面,要扩大学院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力,使其承担教育科研等方面的责任。这样有利于形成学校管宏观,学院管具体的良好局面。

其次,职业院校要改革教师培养、晋升和激励机制。现阶段我国职业院校的一线教师以高校毕业生

为主,因而很多缺乏市场实践经验,所教授的知识及技能也容易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建立教师培养机制的目的在于提升一线教师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课程创新的能力。科学的晋升和激励机制则是吸引高素质教学人才,提升教学能力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职业院校在人事管理上要对教师进行分类管理,晋升和激励性政策应尽量向一线教师倾斜。

最后,职业院校要加强与企业的互动。职业院校和企业的互动包括学生与企业的互动和教师与企业的互动。前者侧重于将学生的实践教学环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干中学”。为此,职业院校应当充当学生和企业的桥梁,将学生引入工作一线,并配备专门的老师进行全过程指导。后者则是指的建立学校教师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双向交流机制。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学校师资水平,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职业教育与市场岗位需求的适配性。

五、结论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革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对各国的劳动力结构与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得职业教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因此,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以行政指令为主要驱动力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推行“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新发展阶段下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构建“多中心治理”型职业教育体系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并非可以一蹴而就,需要各级政府、企业和职业院校群策群力。唯有如此,职业教育才能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参考文献:

- [1] 央视网.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工巧匠大国工匠[EB/OL].<https://politics.cntv.cn/special/gwyvideo/2019/202104/2021041301/index.shtml>,2022-05-20.
- [2] 曾天山,房凤文.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事业百年历程与经验分析[J].中国教育科学,2021(5):27-38.
- [3] 张祺午,荣国丞,郭丹.新中国的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职业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21(33):13-18.
- [4] 王清强,乐传永.2021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热点与未来展望——基于对2021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的统计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6):49-58.

- [5] 董衍美.1978年以来全国教育工作回顾[J].职业技术教育, 2018(30):10-13.
- [6] 孟凡华,刘丽杰.开启现代化征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职业教育[J].职业技术教育,2021(33):19-23.
- [7] 国家统计局.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tjgb2020/201311/t20131107_1768633.html,2022-05-25.
- [8] 国家统计局.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tjgb2020/201311/t20131105_1768629.html,2022-05-25.
- [9] 央视网.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news.got.com/content/2017-10/11/content_16573931_4.htm,2021-10-18.
- [10] 《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里程碑记——关于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J].职业技术教育,2006(9):16-17.
- [11] 卢彩晨,叶子凡.中国共产党领导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百年回顾与展望[J].职业技术教育,2021(25):19-25.
- [12] 黄艳.产教融合的研究与实践[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62-63.
- [13] 李慧凤.城镇化视角下我国职业教育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路径研究[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9:239-240.
- [14] 徐浪.高职院校转型的制度之需与改革之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1):18-21.
- [15] 年艳,潘建林.美、德、日三国职业教育经费筹措机制比较及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9(12):67-73.
- [16] 教育部.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104/t20210427_528812.html,2022-05-27.
- [17] 金炯,金高军.地方性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困境与突围[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7):92-96.
- [18]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2111/t20211130_583343.html,2022-05-27.
- [19] 王明刚.探索学校本位的现代学徒制之路[J].高教学刊,2016(18):13-15.
- [20] 沈宇,陶红.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的历史变迁与制度重构[J].职业技术教育,2020(7):13-19.
- [21] 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M].冯银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96-100.
- [2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96.
- [23] 许悦.多中心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职业教育协调力的提升[J].教育与职业,2015(28):16-19.
- [24] 王菁华,梁伟样,李钧敏,等.德国“双元制”成功奥秘:职业教育标准研发与实施[J].职业技术教育,2020(24):66-70.
- [25] 鄂甜,霍丽娟.德国两国政府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22(6):69-74.
- [26] 王惠莲.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经验与启示[J].教育与职业,2019(5):86-92.
- [27] 王金星.职业教育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327-332.
- [28] 樊伟伟,杨涵涛,刘亢,等.结构功能理论视角下大型企业办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3):31-37.
- [29] 黄亚宇,李小球.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区域性产教融合政策的实现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0(9):34-38.

[责任编辑:许海燕]

Multi-centered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of New Governance System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LI Zhong-ren, LIU Jun, TAO Yun-f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0,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ri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025) period. The core of construct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s to form a reasonable governance structure,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However, under the traditional “single center governance” system in China, it’s hard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o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also cannot showcase their initiatives. For this reaso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move to “multi-center governance”,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and find out the better rol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Multi-centered governance